

GLOBAL  ISSUES

全球化新 **热** 点译丛



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2000年之后的美国与世界

〔美〕尼古拉斯·盖耶特 / 著



商务印书馆

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2000 年之后的美国与世界

〔美〕尼古拉斯·盖耶特 著

丁郡瑜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5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2000 年之后的美国与世界/
(美)盖耶特著; 丁郡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全球化新热点译丛)
ISBN 7-100-04244-5

I. 又… II. ①盖… ②丁… III. 美国对外政策 -
研究 IV.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775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ÒUYÍGE MĚIGUÓ SHĪJÌMA

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2000 年之后的美国与世界

〔美〕尼古拉斯·盖耶特 著

丁郡瑜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4244-5/D·354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⁵/₈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19.00 元

主编 王 炜

编委

陈嘉映 王 焱

葛海滨 王 毅

献给克里斯顿

目 录

致谢.....	1
中文版前言.....	3
前言	19
第一章 美国与全球经济	29
1945 年以后的全球经济	30
“发展”的美国版本:“贸易,而不是援助”	43
华盛顿共识	69
第二章 美国与“国际社会”.....	100
“国际社会”的定义.....	102
“救救每个孩子”:美国与国际维和行动	120
美国与联合国:多边主义的终结	134
第三章 美国与军事强权.....	170
策略.....	171
技术.....	185
冲突.....	198
第四章 美国的使命.....	244
理论.....	245
观点.....	272

2 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后记“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312
西雅图的终结	312
前景	323

致 谢

这本书在 1999 年 7 月至 12 月写于华盛顿特区普林斯顿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在美国,我要感谢温迪·凯奇(Wendy Cadge),劳拉·费斯克(Laura Fiske),安德鲁·格雷比尔(Andrew Graybill),莎拉·伊戈(Sarah Igo),德鲁·利维(Drew Levy),尼娜·佩恩特(Nina Paynter)及艾琳·苏利(Eileen Scully),他们通读了原稿,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艾琳·苏利帮我在普林斯顿校外找到了更多的阅稿者,在此再致谢意。在我写书过程中协助提出具体质疑的有,杰里米·安道曼(Jeremy Adelman),阿斯里·巴厘(Asli Bali),以斯拉·布洛克(Ezra Block),约翰·C. 卡尔伏(John C. Culver),迈克尔·蒂阿尔巴(Michael D'Alba),亚历克(Alec),凯里(Kelly)及马里·当(Mali Dun),詹尼弗·莫尔赫德(Jennifer Moorehead),斯特芬·悉戈尔(Stefan Siegel),艾米丽·希尔弗曼(Emily Silverman),托德·史蒂文斯(Todd Stevens),西蒙(Simon)与伊勒里·泰勒(Eleri Tyler),以及克里斯·任(Chris Wren),感谢他们的好意。克里斯顿·哈尔克涅特(Kristen Harknett)和安德鲁·格雷比尔(Andrew Graybill)非常慷慨地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不讨好的校对工作,对此我深表歉意和满怀感激。克莱尔·明顿(Claire Minton)在索引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在英国(及附近地区),我备受 Zeb Books 的罗伯特·莫尔特诺

2 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Robert Molteno)的恩惠,是他向我推荐了这个项目,并在我交出两倍于原计划字数的书稿时,多亏他的周旋才得以顺利出版。我要感谢我的家庭对我不断的支持。我还要感谢威廉·弗雷明(William Flemming),克诺·豪顿(Conor Houghton),罗伯特·帕默(Robert Palmer),爱德华(Edward),南希(Nancy)与凯瑟琳·肖(Catherine Shaw),以及马特·托恩(Matt Thorne)的鼓励和慷慨帮助。理查德·瑟金森(Richard Serjeantson)通读了书稿,并允许我在他剑桥的工作室中写完这本书,即使在他患重感冒之时。上一次本·杰克逊(Ben Jackson)本该出现在我的致谢名单中,这次也要对他表示我深切的歉意和感激。我还要感谢露西·莫顿(Lucy Morton)以及罗宾·嘉伯(Robin Gable)在排稿过程中所表现的娴熟的技巧、宽宏大量及专心致志。当然,剩下的在事实或阐释上的错误,责任全在我自己。

中文版前言

大概是四年前吧,我开始写一本关于 21 世纪初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书。按照我 1999 年的研究计划,这本书要讨论两个问题:首先,是美国在全球政治和国际经济中行使着一种大得不可思议也不相称的绝对优势力量;其次,美国公众并不完全理解美国扩张和干涉的程度和意义。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后,当美国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中扮演领袖角色时,美国公众大都把对外政策看成只是与周边事务相关。亨利·基辛格在其任职期间,威胁恐吓那些不与美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国家,在 2001 年 3 月也写了一本书,名为“美国需要对外政策吗?”(答案当然是“是”;但是,这样一个公众人物这么严肃地提出问题,正好说明了公众错觉与美国在世界中的真实地位之间的距离。)美国政府官员经常干涉国际事务,而大部分美国公众却是孤立主义者,这种美国力量的悖论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内容。

为了使大家理解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意义,我把 1989 年冷战结束看成世界历史转折点。1945 年以来,美苏之间的持久对抗一直都支配着国际政治也污染着发展中世界的反殖民化的解放过程。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承诺要把欧洲和东亚从法西斯的魔爪下解放出来,而且,也鼓励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摆脱几十

4 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年(或者几个世纪)来的殖民统治。然而,美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冲突如此激烈,以致使从越南到刚果的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都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为了抵抗共产主义的传播美国竟然武力干涉东南亚、拉丁美洲和中东,并对那些出卖民族独立事业的独裁者(蒙博托、苏哈托、萨达姆·侯赛因等)给与财政支持。1989年苏联解体消除了对美国决策者的压力。冷战期间,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数十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到处干涉以“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1989年后,美国的决策者就能更自由地着手建立一种国际体系,这种体系能更好地维护美国利益,又能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普遍理念。

当然,事情并不是如美国所想象的那样。20世纪并不是一个国际合作和民主风行的黄金时代,却是经济两极分化、种族冲突和美国单边主义的危险的、血腥的十年。1991年,海湾战争打败萨达姆·侯赛因后,老布什就希望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虽然小布什和克林顿确实创建了这样的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大致轮廓看上去却很眼熟: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不稳定的附属地,屈从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一种连续的美国式的对专政的偏爱而并非喜欢民主,一种高压政治制度而不是民主政体才能更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一种美国式的摇摆:对别的国家要么是武力干涉(伊拉克和科索沃),要么是政治孤立(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冷战期间,美国最不受欢迎的外交政策就是:热衷于疯狂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倾向于支持高压政体;蔑视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在主要对手苏联解体后,美国的这种气焰更加嚣张。

这部分内容与本书的其他部分相关。但是,这里我必须说说

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 and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安全所造成的后果。正如我在 1999 年 12 月所写的那样,显然,美国致力于苛刻而不公正的外交政策——比如经济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刁难;政治上,以美国为首的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将产生危险的后果。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政府并未能真正地实现其控制,就如我在本书的第四章里所写的那样,美国的听话的媒体和以法人资金与意识形态认同为特征的政治体制都不是真正为美国公众服务的。同时,联合国并不能独立地对美国的决策施加影响,因为联合国的官员不敢得罪美国这个发薪水的老板。第二章详细描述 的 1996 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辞职事件表明:自从 1989 年以来,美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的强大影响,以及那些有可能站在美国这一边的个人或者国家所付出的代价。

美国公众意见或者联合国无法对美国施加任何影响。很显然,如果预期的反应没有出现,那么,美国很难继续控制世界。即使是比尔·克林顿(以及后来的乔治·布什)为了实施“星球大战系统”,以对抗一个拥有弹道导弹的流氓国家对美国所造成的威胁,投资数十亿,也是如此。1993 年,伊斯兰激进分子轰炸世贸大厦,显示了美国所面临的真正的危险。看起来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如此强大,任何一个国家直接对美国发动攻击似乎都是极其愚蠢的;而且,任何一个政府或国家赞助恐怖分子把美国当靶子,它根本不可能逃避美国强大的军事反击而免遭覆灭(可能是灭顶之灾)。然而,正如世界经济全球化一直在制造着一种新的经济对抗以及普遍对抗的跨国界的联盟,同样,与此相关的而且不那么明显的激进化的过程也一直催生着一股从苏丹到菲律宾的反对美

6 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国外交政策的力量。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不满的增长,组织一组军事行动以图重现 1993 年的攻击,对美国目标实行毁灭性的打击看起来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一个精确的“导弹防御系统”和每年近 4000 亿美元的军费开支,竟然对这种威胁没有丝毫的防御能力!

这本书的初衷,既是批评美国没有抓住冷战结束这一机会,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多边的世界秩序,也是一种警告:在 21 世纪美国的权力不受制约是很危险的。2001 年的 9·11 事件就是对第二点的清楚而可怕的说明。这次事件中,在美国的土地上有 3000 人失去了生命,这对于美国人的心理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也迫使美国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思考此次灾难的原因。“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灾难之后的几个月里,这是美国人民反复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在公众的惊讶和怨恨之中,还包含着探究事件的根源以至探究美国在海外如何卷入了麻烦的巨大兴趣。为什么 19 个劫机者当中有 15 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在中东的最强大的伙伴之一?拉登基地组织很快就被认定是 9·11 劫机事件的罪犯,他们与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赞助的阿富汗反苏入侵的伊斯兰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极端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与巴基斯坦和埃及亲美政府有什么联系?在乔治·布什入侵阿富汗的几个月前,美国公众已经非常紧迫地提出了这些问题,理解美国所面临的威胁的愿望看来和想要通过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消灭威胁的愿望差不多同样地强烈。

在 18 个月的自我审视中,美国离算清 9·11 这笔账却越来越远了。在阿富汗消灭了塔利班之后,许多美国公众或者重新关注日常生活,或者放弃了国际事务而成为国家政府部门和国防部门的“专家”。更为严重的是,乔治·布什政府采取了一个新的外交策

略,使 20 世纪 90 年代的错误趋势更加严重,也使美国面临着遭受新一轮攻击的危险。虽然,关于这一新政策的轮廓在以下若干章对总统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的讨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还是应该解释一下乔治·布什关于外交政策的最初想法和 9·11 事件之后其外交政策的转变。

2000 年 11 月,乔治·布什和阿尔·戈尔之间的总统选举紧锣密鼓地完成,投票结果相差很少(总票数一个多亿,只差几百票),最终不得不由美国最高法院争议裁决,才得出最终结果。投票之前的选举预测表明了布什(共和党)和戈尔(民主党)的政治力量相当。随着这种主要政党之间的力量平衡,民主党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分支——所谓“新民主党”,它大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否认民主党自己维护工人利益的历史和真正卷入经济事务管理(最著名的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 1933~1945 年的“新经济政策”)。1993 年执政时比尔·克林顿是“新民主党”的代表人物;在 2000 年的选举中,他的副总统戈尔好像准备要继续执行他的政策。假如戈尔和布什的经济政策没有什么不同,在海外也继续贯彻这种政策是总统的核心职责之一,2000 年选举(尤其是戈尔和布什的公开辩论)如此引人注目,就不是因为激动人心的辩论,而是因为以下这个与此截然相反的原因:布什和戈尔简直就是——一对政治双胞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

令人奇怪的是,从辩论来看,在对外政策上布什不像他的民主党对手那么主张单边主义。克林顿政府反对或拒绝很多国际倡议,比如关于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反对使用地雷协议和国际刑事法庭这样的东西;布什承诺,与他的民主党对手相反,他将寻求

8 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低调”地处理与别国的关系。他这句话的含义可能是：他将不再像克林顿政府那样过于频繁地干涉国际事务；确实，布什一直不像戈尔那么喜欢签京都议定书和国际刑事法庭（实际上，布什选举获胜之后不久，就愚蠢地拒绝了这两个协议，这给了美国和欧洲的评论家[完全错误的]印象：是美国而不是民主党拒绝参加这些多边协议）。而且，在最初的九个月里，布什政府表现得像是新总统对外交事务没什么兴趣。除了预料之中的迷上了建立一个导弹防御系统（这不仅是1999年比尔·克林顿就着手了，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共和党人梦，也是忠实于系统创始人共和党人里根的一种形式），还有就是因为2001年4月被迫降的美国间谍机而引起的与中国的令人烦恼的对抗，看起来布什是希望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重要事务（减税和教育改革），而不是花时间去改造世界。

对布什说来，以下两个因素使得一切都变了。第一，作为比尔·克林顿连任两届的标志——长期的经济繁荣很快成为泡影，互联网泡沫和经济基本规律对这种繁荣起的作用差不多大。虽然，布什可以要求他的民主党前任为此负责，但是，他自己以及他的几位政治伙伴与经济衰退的几个首恶分子的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对他个人的声望影响极其严重。而且，经济衰退使预计的政府余额很快就变成了巨额赤字，使他降低税收的主要目标越来越难实现。因此，第二，具有更加重大影响的因素——9·11事件与美国新出现的经济衰退一起迫使布什政府采取更夸张的外交政策。从纽约和华盛顿遭到袭击之后的第一天起，布什就提出了正义与罪恶的斗争，一场消灭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保护美国不再遭到攻击的“圣战”。到10月份，美军开始驱逐阿富汗的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

政府,布什发动了他的“反恐战争”,这是一场他确立为他这任总统的日常工作中心的斗争。他鼓励在 9·11 事件中受到伤害的美国公众并保证,他有处理这种恐怖威胁的预案,虽然经济恶化、华盛顿和华尔街财政丑闻层出,布什的公众支持率却达到了历史最高。

布什的预案看着像是什么?是此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转折还是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和阿尔·戈尔的外交政策的继续?以下三个不同原因可以解释“反恐战争”的演变。首先,布什对 9·11 事件的直接反应就是,他以非黑即白的论调来判别别人怎么看美国和恐怖主义之间的斗争:“你不与我们合作,就是与恐怖主义合作。”9·11 事件一周后,他对支持他的美国国会这样说。其次,在 2002 年 1 月,他在演讲中宣布有一个“邪恶轴心”包括伊拉克、伊朗以及朝鲜(4 月,这个名单又增加了叙利亚、利比亚和古巴)。最后,9 月,布什政府发表了一份题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文件,宣布美国不仅与那些威胁美国利益的国家作战,还与那些向美国军事优势挑战或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战。因此,到 2002 年秋天,正当布什决定把注意力从本·拉登转向萨达姆·侯赛因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基础业已稳固: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不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就是基地组织或其他恐怖组织的盟友;特殊的政治制度将被看成是“罪恶”的,会成为美国将来军事行动的目标;世界上将没有一个国家能挑战美国的优势。根据制定的这些标准,布什总统用了一系列外交手腕,最后是军事行动,结果 2003 年 4 月,美军占领了巴格达。

对于一个旁观的观察家来说,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战略特点在于:他们在处理世界事务时,特别关注那些被当作潜在的罪犯

(或者如布什所称“坏蛋”)的民族国家。9·11 事件证明,针对美国政策的暴力活动,并非来自于特定的国家,而是源于那些来自许多国家而且能自由出入的个人组成的组织。也许推翻塔利班或萨达姆·侯赛因很简单,但是,与没有明显运行基本特点或行政机构的恐怖主义作斗争就困难多了。我在本书的第三章说到这种非国家形式的激进分子,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给美国造成致命的打击,这种拼命三郎一起闹极难发觉也极难防范。如果美国的决策者真的要与那些好斗的非政府恐怖主义作斗争,最好的方法就是:首先,先去对付那些产生恐怖主义的政治不平;其次,尽一切可能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泛滥,让这些人难以威胁我们。关于基地组织的起因和动机,还有的是可争论的,但是显然就是美国入侵或占领阿富汗、伊拉克或任何别的什么国家,好像也不可能消灭或击败它的运行机制。以色列政府就总是在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发现恐怖活动,即使是军事占领,也不能阻止好战组织的暴力反抗;实际上,如果能从以色列吸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军事占领加剧了而不是阻止了恐怖主义。

那么,为什么布什政府对于 9·11 事件的反应是这样一套战略,它针对的是“邪恶轴心”以及来自民族国家的威胁,而不是针对非国家的行动者或那些流动的好战组织? 这里,我们只能探讨一下政府的行为和公开的表态,也可以思索一下他们的动机。针对“邪恶轴心”的显而易见的基本理由是:布什想要一再向美国公众保证,他们所面临的威胁说到底可控的。在 2002 年 1 月的讲话中,布什把伊拉克、伊朗以及朝鲜列为打击对象,他就是要告诉美国公众,美国政府就是把他们认作世界上的“罪恶”之源的。如果